

汪文学学术作品集

汪文学 著

正統論

——中國古代政治權力合法性理論研究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正統論

——
中國古代政治權力合法性理論研究

汪文学学术作品集

汪文学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 / 汪文学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4
(汪文学学术作品集)
ISBN 978-7-221-15145-2
I. ①正… II. ①汪… III. ①权力-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7446 号

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

汪文学 / 著

责任编辑：刘泽海 陈思宇

封面设计：陈 电

封面题签：李华年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22.5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1-15145-2

定 价：9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汪文学，男，1970年生，苗族，贵州思南人，文学博士，教授。现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省政协委员。曾任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文学院院长、教务处处长，全国青联第十、十一届委员。曾获得“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进步优秀奖”“贵州青年五四奖章”和“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贵州省甲秀文化人才”称号，被评为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教学名师。主讲的“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被评为国家级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贵州省文艺奖多项。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贵州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2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述10余种，即《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2002）、《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2003）、《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2004）、《汉唐文化与文学论集》（2008）、《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2009）、《诗性风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爱》（2011）、《中国古代性别与诗学研究》（2012）、《中国人的精神传统》（2012）、《道真契约文书汇编》（2014）、《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2016）、《扬雄与六朝之学》（2019）、《蟪蛄馆使黔日记（点校）》（2019）等，主编大型地域文献丛书《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中国西南布依摩经丛刊》等数种。

“汪文学学术作品集”序

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到中年，经营一些大的课题，常感力不从心。但此生已无改行的可能，学问之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只能勉力为之。孤灯夜伴，展玩书卷，摆弄文字，后半生的日子大概只能这样去过了。”（《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落款时间是2016年4月。当时提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真诚的，绝无半点矫情。可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不到三个月，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真的改行了，从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大学教师岗位，调到政府部门做公务员，从事文化和旅游管理工作。说实在的，这个变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真的是人世变幻，沧海桑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二十三年的学术生涯，几乎占去了一个人可以正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得从头开始去做一件完全陌生的工作，想起来确是心有余悸。从专业的学术研究者转身为职业的行政工作者，师友间戏称为是“学而优则仕”，或者称之为“华丽转身”。这个“转

身”是否可称作“华丽”？现在很难断言。

在这样一个人生与学术之重要转折时期，对既往的学术工作进行总结，对未来的业余学术研究进行规划，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编辑个人学术作品集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并得到出版界朋友的积极支持和大力襄助。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学术经历中，我先后出版专题研究著述五种（《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诗性风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爱》《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学术论文集二种（《汉唐文化与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性别与诗学研究》），文献整理著述三种（《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道真契约文书汇编》《蟬香馆使黔日记》），学术普及读物一种（《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主编地域文献丛刊两种（《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沿河卷》），待出版的专题学术著述三种（《扬雄与六朝之学》《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学》《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等等

如今编选个人学术作品集，并非是对个人学术作品的汇编，而是选择其中自认为比较重要，有再版之价值，围绕某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核心观点且能自圆其说的专题学术著述。经过慎重选择，共计八种：《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诗性风月之光华——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扬雄与六朝之学》《温柔敦厚：中国

古典诗学理想》。以下，略述各书要旨，以便读者选择阅读。

《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此书于200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原名为《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这是当时应出版社的要求改定，现更名为《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如此与书稿本身的内容更加吻合。与传统学者仅仅将正统论视为一种史学观念不同，本书认为，作为一种观念或理论，正统论既属于史学范畴，又属于政治学范畴。准确地说，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观念，然后才是一种史学观念。虽然古代中国的正统之争多以史书为载体，通过史家的褒贬书法表现出来。但是，史上的正统之争是政治上的正统之争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惟一的手段。所以，正统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正统之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合法与非法之争；正统论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本书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探讨其本身的理论结构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辨析其与西方权力合法性理论之异同。通过这项研究，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聚讼不已的政治、文化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另一方面是藉此发掘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制度文化资源。本书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写作于十五年前，虽然文字表述不免稚嫩，但其基本观点至今仍然坚持。本次再版，仅作部分文字上的修订和润饰，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未作大的改动。

《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此书于200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以汉末魏初为转折点，以汉朝四百年为一阶段，以魏晋六朝四百年为一整体。汉晋文化思潮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东汉末年，与当时盛行的

人物品鉴和尚通意趣，有密切关系。或者说，魏晋之学始于汉末，始于汉末之人物品鉴，起于汉末知识界盛行的尚通意趣。本书力图从汉末魏晋六朝之知识界广泛盛行的尚通意趣之角度，对汉晋八百年间文化思潮之变迁作总体的考察，探讨其变迁之“内在理路”。揭示出在汉末魏晋六朝知识界普遍盛行而又被现当代学术界普遍忽略的尚通意趣，分析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特点的尚通意趣，对其间人物品鉴、士风、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尚通意趣这个独特的视角，对汉晋文化思想史上的若干分歧问题，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内在理路”问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提供一种可能的诠释。此次再版，在引用的材料上做了部分增减和再次核实，在文字上做了一些润饰和调整，但基本观点未作任何变动。

《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此书于2004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首次出版，原名为《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现更名为《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本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以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基础，旁及由父子伦理衍生而来的祖父、母子、父女、师徒伦理，援用现代社会心理学、民俗学等理论，对其伦理现状形成之原因，从历史、文化、心理、习俗等方面，进行追本溯源的诠释。尤其是对传统民间社会诸多隐而不显的人伦现状，或者是被道德家有意掩饰的人伦关系的真面目，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深入的阐释，从而展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秩序的真实状态。真实地展现传统人伦关系的本来面目，并用现代观点予以充分诠释，是本书的宗旨。本次再版，在章节题目上做了较大的变动，使之更为醒目；删去部分略显枝蔓的文字，使之更为紧凑；在文字表述上做了一些润饰，使之更为简练；在材料上做了部分补充，使之更为充实。

至于其基本观点，则未作任何改动。

《诗性风月之光华——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此书于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首次出版，原名为《诗性风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爱》，这是当时应出版社的要求改定，现更名为《诗性风月之光华——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本书综论传统中国社会两性情爱关系之现状，研究传统中国人情爱生活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现状的反差，讨论传统中国人诗意化、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探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的诗性精神。传统中国人的诗性精神，在其情爱生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研究华夏族人的文化心理和诗性精神在其情爱生活中的具体呈现，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我们认为：诗性精神是传统中国社会情爱生活的基本特征。古典艺术作品是传统中国人诗性精神的直接体现，传统情爱生活是古代中国人诗性精神的间接展现。研究传统中国人的诗性精神，艺术作品是文本依据，情爱生活是鲜活证据。本次再版，在不影响整体阅读的情况下，删去了与《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雷同的部分，增补了部分材料，在文字表述上做了一些修改。

《中国人的精神传统》。此书于2012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非专题研究著作，而是将自己过去从事的几项专题研究成果中，比较适合大众接受的十个专题，如中国人的盛世情怀、家国观念、经典意识、诗学理想、诗性精神、山水情怀、逐鹿策略、英雄崇拜、师道传统、父子伦理等等，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因此，本书介于专业研究与学术普及之间，论题的专业性与表述的通俗化，是我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因此，本书虽非专题学术著作，但论题的专业性是可以保证的，论题之观点亦非常识介绍，而是

基于个人独立的学术见解。在表述上亦非原文照抄，而是做了尽可能的通俗化和趣味性处理。本书曾作为大学文科学生通识课教材，部分内容录制成教学视频，发布在教育部“爱课程”“网易公开课”等网站，被评为“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所以，作为“作品集”中的一种单独出版，亦有一定的价值。

《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此书是2012年度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边省地域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研究”的研究报告，于201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以黔中古近代文学为例，依据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边省地域空间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探讨边省地理环境、地域区位和地域文化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以为“多山多石”之黔中地理特征和“不边不内”之黔中地域区位为特点的黔中“大山地理”，孕育了多姿多彩、五方杂处、和而不同的黔中“大山文化”。在黔中“大山地理”和“大山文化”之影响下产生的黔中“大山文学”，它的传播不仅受到“大山地理”和“大山文化”之影响和制约，它的生产亦深深地打上了“大山地理”和“大山文化”的烙印。黔中“大山地理”和“大山文化”赋予了黔中“大山文学”的创新精神和“边缘活力”，制约了黔中“大山文学”的文体选择，影响了“大山文学”的题材取舍，铸就了“大山文学”的“大山风格”。本次再版，在引用的资料上做再次核实，在文字表述上稍作修改，其他则未作大的改动。

《扬雄与六朝之学》。此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尚未公开出版。本书研究之论域有二：一是关于扬雄学术思想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二是关于六朝之学之渊源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关于扬雄与六朝之学之

渊源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扬雄之生平经历、家族背景、师友网络、人生哲学、性情好尚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影响六朝之学的个人可能性；通过对其学术渊源、思想背景、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六朝之学的具体影响。其最终目的，就是证实“六朝之学始于扬雄”这个学术“假说”。本书是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一书之基础上，在尚通意趣这个大背景下，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持续研究，其基本观点亦有进一步的深化和修正（即从“魏晋之学始于汉末”发展至“六朝之学始于扬雄”）。

《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此书尚未公开出版，部分内容在研究生课程上讲授过。本书在区分中国古代诗学之“古典美”和“现代性”之基础上，力图呈现中国古典诗学之理想品格——“温柔敦厚”产生的理论基础、思想背景，分析其基本内涵和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探讨其对中国文化特质之形成和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之涵养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对当代国民教育的借鉴意义，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中国古典诗学以均衡、和谐为主要特征，以雅、厚、和为最高追求，以“温柔敦厚”为理想品格。本书即是从“温柔敦厚”这个理想品格的角度讨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般性特征，包括审美特征和教化功能。彰显“温柔敦厚”说的现实意义，消除长期以来积压在“温柔敦厚”之上的偏见和误解，还“诗教”说以本来面目，阐释“诗教”说的社会价值，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事博大精深、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学术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传统经典文本和学者研究著述，堪称汗牛充栋，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理解、消化和思考。所以，在这个

学科领域，“晚成”是必然的。在一般情况下，“不惑”之年方可“登堂”，“知天命”之年才算“入室”，“耳顺”之年才渐入佳境。而我在尚未步入“知天命”之年，就着手治学反思和学术总结，并编辑出版个人学术作品集。我深知这种做法有欠妥当，但亦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个人学术经历由“专业”转身“业余”之际，反思过往，展望未来，编选作品集，于自己是一个总结，亦是一个纪念；于长期以来关心、鼓励和支持我的师友，亦是一个交待。

汪文学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日

序言：重建中华主流精神

——发现东方政治智慧

刘家全

中国历史的长河又流淌过去了百年。这一个百年绝非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百年可比。由于世界的剧变，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应对这一剧变中，自己也发生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否有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很遗憾，我们至今还未看到。尤其是民族主流精神的构建路向仍然混沌不清。旧有的东西被我们在这百年间毁弃了，虽然引进了西方的许多“精神”，有些甚至一度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当历史恢复常态后，我们却发现真正属于并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特性的主流精神是缺位的。现在，虽然踏进了新世纪的门坎，我们却仍像百年前的先辈一样，面对民族纷乱的精神现状，突出的感觉仍是茫然无所措。

也许，照现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这原本就是正常的，即现代化等于多元化，而多元化的特征就是无主流。这的确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论点。

然而却也有一些国人对此并不甘心，也不能苟同。因为无论是来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依据，还是出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我们的民族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流精神。

当然，还有一种论点是“中国现在就有主流精神”，这种论断颇有力度，一下子便能将否定论者逼向墙角，似乎并无议论主流精神的必要。然而，不是还有那句铭刻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界碑上的名言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果如此，以目前我们的社会现实而论，主流精神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为何还要强调“以德治国”。

问题的关键还是重建什么样的主流精神和如何去重建这一主流精神。

显然，民族的主流精神必须满足国人的两种基本精神需求，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全其美自然最为理想，如过去百年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涌现而出的共产主义精神那样，同时给人们提供了信仰、道路和方法。也正因此，革命才得以胜利。问题是当革命过去，回归于常态，在革命运动中因“翻身求解放”的需求，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将革命时期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黏合在一起的革命热情，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而宣告结束，人们普遍回归世俗，社会生活回复到以亲亲友友的人伦关系为主流的状态，这就需要将适应革命运动的两种理性体系及时调整为常态下的两种理性体系，以满足生活在世俗状态下人们对两种基本精神的需求。但不幸的是，革命后的几十年间，这种调整并没有完成，甚至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还没有开始。今天，世界现代化的诉求已日臻理性与系统，我们以为，真正的现代化就是本民族的现代化，也就是能给我们的民族成员带来普遍的精神和物质满足的现代化。

回顾世界近现代思想史，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似乎成了大

趋势（当然，这两种理性是相互渗透影响着的，有时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对此不赘述）。我们都已看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代表价值理性的宗教从社会的许多方面退出，而代表工具理性的科学则深入到人们广泛的世俗生活领域。尽管这一二元分立的现象表露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西方也由此而面临价值理性的弱化，但由于西方宗教传统深厚，其社会的现代化给两种理性所造成的影响最多也就是形成了“上帝的事上帝管，凯撒的事凯撒管”的局面。不仅如此，据德国著名现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上帝还是能促进凯撒事业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全面论述了西方基督教伦理如何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新教伦理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而且也产生了一种积极自觉的劳动精神。

百年中国的不幸却在于整整的一个世纪当中，活跃于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党派各个学派中的文化思想政治精英们基本都不从本民族已有的主流精神中生发现代理性，而是片面极端地毁弃自己的价值理性体系，试图以引进的西方思想（主要是工具理性）作为本民族的主流精神内核。于是，简单地用工具理性代替一切就成了这百年中华民族思想演变史上的一大特色。当然，这样的片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异族强大的工具理性给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工具理性救亡图存便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张。

终于，百年后的中国没有被异族亡国的危险了，但我们并有感到些许的轻松。因为百年来，用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取代一切来建设发展本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权且当成以科学主义为主流思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并非如此，而是流行着相反的迷信意识），已

使民族的精神全面地简单化、工具化、实用化、世俗化、势利化和无序化，由此而使中国传统主流精神的对立面诸如游民意识等沉渣泛起、反客为主，其结果便是民族自身的精神危机愈来愈突出，并且正在迅速向精神以外展露这一危机孳生出来的种种苦果和恶果。严酷的社会现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科学思想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民族主流精神的基本思想方法，但科学思想毕竟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它并不能成为民族主流精神的主要成分，更不能取而代之。科学技术可以引出现代物质文明，却无法解决相生相伴的现代精神文明的各种危机。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主要依赖从民族主流文化中散射而出的精神（而非宗教）才能安身立命的民族，就更显其主流精神缺位的危险了。这一切当然难免会使一些有识之士产生“杞人之忧”。于是，重提并系统思考重建民族主流精神的主张和议论便彼伏此起。显然，这是一项宏伟而浩大的民族复兴工程。此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社会的力量也不应忽视，后者往往还能发挥有一定风险但却常常具有前瞻性探路的作用。这也正是笔者不避辱没学问之嫌，受国内一些思想文化学者鼓动而从正在迅速做大的企业中分心旁骛，做起既费神又赔本的务虚“生意”的缘起和动机。

前述关于主流精神应同时提供两种理性需求的问题，的确不易做到。由于百年中国已让代表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深入人心，加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厚重的实用理性这一特色，所以所谓的重建主流精神现在恐怕主要是价值理性的重建了。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性体系，以笔者愚见无法绕开儒家精神，即必须以儒家思想作为重建民族主流精神的主干。这并不是说重建民族主流精神一定不能离开本民族的思想泉源，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开放时代提示我们也有选择西方主流价值理性或中国本土其他学说价值理性的权利，但只要深入客观

公正全面地比较，我们又似乎别无选择（这里所指的是主干，如枝叶当然是应吸纳中外其他思想流派的）。关于儒家文化的争论本短文不能也不便再作评述，只想在此就其选择理由提出一二。

其一，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以人为本元的价值意义系统。它虽不属西方概念中的宗教，但由于以亲情友情为导引，比之西方的宗教，它更能贴近人心，并且能给人提供一个完全现世的今生的、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近乎系统完美的奋斗蓝图和生命意义体系。只要照此践履，人生就不但是充实的，也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今生的世间找比在来世的天国找不但更符合中国人重世俗人生轻彼岸世界的习惯，也符合现代人的科学理念。这一理由排除了以西方宗教为主干构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的思路。

其二，只有儒家思想才是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数千年间，它包容吸纳影响改造了其他流派的文化，塑造了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直至今日仍对现代人发挥着巨大的无法抗拒也无法回避的潜移默化作用。其思想体系在形而上具有深刻的哲学精神，其形而下又具有普世的教化作用。不论是文人高官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够赖其而安身立命。以其作为主流精神的主干，本身就具有广泛而牢固的基础。这一理由排除了以中国本土的其他思想流派作为主干构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的思路。

支持以儒家思想作为重建民族主流精神主干的功利性理由就更多了。比如，儒家的中庸之道，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套科学的思维方法；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态度能激励当代人奋发图强，振兴民族；儒家的礼治思想有利于维持社会的有序和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使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达到一种最优化的平衡；儒家的忠恕之道体现了发自内心的入道主义